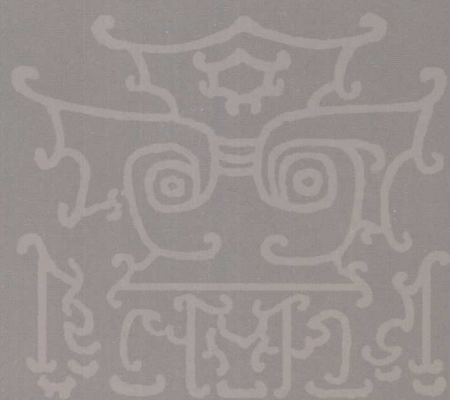




东方考古

第4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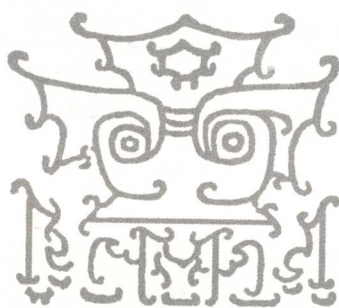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山东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东方考古

第4集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辑的关于考古学和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系列丛书，分集陆续出版。本系列丛书以中国东方地区和东亚地区考古学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它的出版，将对推动中国考古学和东方文明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4集收录20篇研究论文和1篇发掘报告。集中探讨了商代文化面貌、农业和手工业形态、环境状况以及夷商关系等问题。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研究者、爱好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考古. 第4集/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1365-5

I. 东… II. 山… III. 考古—东方国家—文集 IV. K8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3351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鲁 素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3 1/4 插页: 5

印数: 1—1 600 字数: 777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东方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栾丰实

副主任 方 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广 王 青 方 辉 白云翔

任相宏 佟佩华 陈淑卿 赵 辉

栾丰实 崔大庸 靳桂云

秘 书 陈淑卿

序

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自 20 世纪初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 80 多个年头。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 20 世纪结束之前，基本建立起中国主要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时空框架。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正处于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考古学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考古学研究的多样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考古学呼唤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渴望能够提供更多信息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诉求在世界考古学的平台上来进行中国考古学研究。于是，各种理论和方法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从调查、勘探、发掘到分析、整理和研究的考古学全过程，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结合日趋紧密，这些已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显著特点。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推动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与国内外考古学者的联系和合作，并体现今后的研究重点和优势，山东大学于 2002 年春正式组建了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心下设史前考古、历史考古和环境考古三个研究室，建立了以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为主的环境考古实验室。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将最大限度地运用山东大学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在学校的支持下，整合各种可利用资源，切实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所谓东方，其中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中国的东方。以海岱、燕辽、太湖地区为主导并包括东北北部和闽台在内的东方地区，不仅地域上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所以，究明这些地区古代社会和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中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和融合，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任务和长远目标。二是指世界的东方。不仅包括中国，在分布地域上也涵盖了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与中国内地地域相连，文化上的联系源远流长，在人类的产生和迁徙、农业的出现和扩散、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等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和进步方面，相互之间是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进一步加强这些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开展并深化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是今后考古学发展的一个

方向。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学术文集，也是有志于东方考古研究的学者们开展学术交流的园地，我们热忱欢迎来自海内外的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东方考古》的成长过程中，期盼着学界同仁的关心、呵护和扶持，以为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和发展尽到绵薄之力。

栾丰实

目 录

序	栾丰实 (i)
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	许 宏 (1)
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夏代墓葬及其相关问题	赵新平 范永禄 (7)
论岳石文化的终结——兼谈大辛庄商文化第二类遗存的性质	徐 基 陈淑卿 (15)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植硅体研究	靳桂云 方 辉 (30)
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	陈雪香 方 辉 (47)
济南大辛庄遗址商代石器工具组合的类型学研究——基于生产系统与功能的视角	钱益汇 方 辉 (69)
商王朝东土的夷商融合	邵望平 (95)
“长子口”墓的新启示	李 峰 梁中合 (104)
泗水流域的商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多重建构	燕生东 王 琦 (117)
前掌大墓地中的“史”及其他——读《滕州前掌大墓地》	李朝远 (154)
藁城台西邑落居址所反映的家族手工业形态的考察	王震中 (162)
商代计时器具初探	岳洪彬 岳占伟 何毓灵 (175)
论商族在东方的重要据点——奄	石兰梅 (186)
花东甲骨文小识	宋镇豪 (197)
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札记二则	刘 源 (209)
殷代卜辞中的东、西与阴、阳方位	沈建华 (218)
商王朝都城屡迁原因探赜	江达智 (227)
甲骨文中的“人方”	孙亚冰 (237)

殷墟出土大字骨版刻辞的史料性质考辨	崎川隆 (248)
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形态变迁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	
..... 方 辉 文德安 加里·费曼 琳达·尼古拉斯 栾丰实 于海广	(253)
大辛庄遗址 1984 年秋试掘报告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288)

CONTENTS

Preface	Luan Fengshi (i)
Shang Civiliza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Proto-history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	Xu Hong (5)
Cemetery of Erlitou Culture at Mengzhuang Site in Huixian and Relevant Issues	 Zhao Xinping Fan Yonglu (13)
A Discussion on the End of the Yueshi Culture: With Comments on the Second Type Remains of the Daxinzhuang Site	Xu Ji Chen Shuqing (29)
Phytolith Analysis at Daxinzhuang Site (Shang Dynasty), Jinan	 Jin Guiyun Fang Hui (43)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hang Dynasty: Macro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axinzhuang Site, Jinan, China	Chen Xuexiang Fang Hui (68)
The Ty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Stone Tools' Combination of Shang Period from Daxinzhuang Site of Jinan: Based on the View of Productive System and Function	Qian Yihui Fang Hui (94)
The Fusion of Yi and Shang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Shang Dynasty	 Shao Wangping (103)
The Tomb of "Zhangzi Kou" and Its Implications	Li Feng Liang Zhonghe (115)
Thoughts on the Multi-faceted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ic Period Politics in Sishui Vallege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Yan Shengdong Wang Qi (153)
Discussions on the "史 Shi" from Qianzhangda and Related Issues	Li Chaoyuan (161)
An Inspection on the Family Handcrafts of the Settlement of Taixi, Gaocheng	 Wang Zhenzhong (174)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 the Shang Dynasty Timing Devices	 Yue Hongbin Yue Zhanwei He Yuling (185)

An Important Base of the Shang People in the East: Yan	Shi Lanmei (195)
Some Views for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from East Locus of <i>Huayuanzhuang</i> Village, <i>Yin</i> Relics	Song Zhenhao (208)
Two Studies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Excavated at East Locus of <i>Huayuanzhuang</i> Village, <i>Yin</i> Relics	Liu Yuan (217)
Directions of East-West and Yin-Yang in Oracle Bones of Shang Dynasty	Shen Jianhua (226)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Shang Moving Capitals	Jiang Dazhi (236)
Ren-fang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Sun Yabing (247)
A Research on the Feature of Oracle Bone with Big-characters from <i>Yin</i> Relics	Sakikawa Takashi (252)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Southeastern Coast Area in Shandong, China	Fang Hui et al. (286)
The Trial-excavation Report of Daxinzhuang Site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autumn of 1984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Archaeology Studie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515)

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在 20 世纪的数十年中, 中国考古学界一直未普遍采用国际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时代”的概念。这一由于文献很少, 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1]曾被评价为“从实际意义来说, 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2]。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 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一介于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重要时期^[3]。我们认为, 史前、原史与历史时代三分法的提倡有助于学科发展及对中国古史进程的总体把握。

总体上看, 倾向于同意使用“原史”概念的学者在对“原史时代”的时间位置和基本定义的认识上并无太大的分歧, 但概念的模糊和不确定(如仅把这一时期定义为“文献记载不足、需要大量考古工作补充的时代”^[4]), 仍使中国“原史时代”年代范围的界定缺乏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因此, 在具体划定中国“原史时代”的上下限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表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比较简单的想法, 是将夏商周三代都划归这个时期。”^[5]

表一 关于中国“原史时代”划分的主要观点

主要观点		夏鼐、王仲殊	石兴邦	李学勤	钱耀鹏	吴晓筠	笔者
时 代		1986	2001 ^[6]	1984、2004	2002	2002	
秦汉及以后		商始					晚商始
战 国							
春 秋							
西 周							
殷 墟	商 夏 五帝 三皇			夏始	五帝始	夏始	
二里冈							
二里头							
龙 山							
仰韶及前仰韶							

注: 史前 原史 历史 , 表二同。

* 引者著: 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

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7]（表二）。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徐旭生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做传说时代”^[8]。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

表二 史前、原史、历史的阶段划分与对应史料

史料与分段		直接文字材料	间接文字材料	文献史分期		历史阶段
时 代						
秦汉及以后		较系统的记录		书写历史	编年史	历史
战 国						
春 秋						
西 周						
殷 墟	商	零星或无		口传历史神话		原史
二里冈						
二里头						
龙 山	夏			口传历史神话		史前
仰韶及前仰韶						

法国《史前大辞典》指出，“原史”这一概念“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9]。这一表述具有代表性。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10]。关于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与历史（history）时代的划分，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相关讨论也应在这一前提下进行。

我们认为，一般被划归“原史时代”的龙山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由文字材料所决定的社会集团被复原的程度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着重大的差别。具体而言，可以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的龙山、二里头至二里冈时代诸文化，均属于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

材料，属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11]）所追述，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后一阶段的晚商、西周王朝文化则已有了直接的文字材料来“自证”其族属或王朝阶段，因而已不属于“无法依据文字材料复原的群体”。其与以后的历史时代考古学文化，在文字材料的占有上仅有多寡的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即便典型的“历史时代”如中古甚至近古时期，也并非均“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其内容也“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12]。因此，目前“原史时代”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应即在此。简言之，从宏观的角度看，“历史时代”可定义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证”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的时代。

应当指出的是，与商文明有关的三大考古学文化的史料性质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殷墟文化已被确证属商代晚期。二里冈文化作为早于殷墟晚商文化又与之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可推定为商文化。但其本身还没有可“自证”身份的文字材料，因而还具有“原史时代”文化所特有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由于不能确认二里冈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所以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文化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夏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对相关的考古发现有如下的总结：“1952 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冈更早的文化遗存。”^[13]这相当准确而贴切地表述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到目前为止，也是由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类似二里冈文化乃至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的族属及所属王朝阶段之类的问题，是无法通过考古学的努力来解决的。正因为商文明介于“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上，可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这种状况导致商王朝的下限已经澄清，而上限则仍是模糊的，迄今为止还无法究明。就方法论而言，“原史时代”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质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极强的相对性，这是应引起研究者“自觉”的。“任何把个人的描述、解释和复原绝对化的倾向都没有意识到考古资料的局限性，当然更没有意识到解释者个人所处时代和能力的局限性。”^[14]

有关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归属及其与二里冈文化的关系问题存在多种假说。与此相应，关于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究竟属文献记载中的哪座都邑，也有多种推定意见。择其要者，可罗列如下（表三）。

由表三可以显见，只有最后一种推定意见，即以小屯宫庙区为中心的洹南殷墟属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的观点，因有直接文字的出土而可成定论，对其余诸遗址的性质归属问题均存在多种推测。到目前为止，除了“偃师商城盘庚亳殷说”^[15]因与考古事实相差太远而不为学界接受外，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其他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没有证据去证实或否定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和早商的历史。在可“自证”遗存归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由于学科的局限性，考古学尚无法使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成为真正“信史”的一部分，尽管学术界一直寄望于通过发现的机缘与自身的努力将“历史时代”的上限进一步提前。

早有学者指出考古学存在着若干局限性，其中之一是，“考古学只能见到人们表现

* 着重线为引者所加。

于物质的活动，和能揣测到物质遗存所能体现的人们的关系及其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16]。落实到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说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展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可以探索文明的形成过程，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夏文化、商文化同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17]如前文所述，前殷墟时代的遗存因尚未进入“历史时期”而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整合性研究结论也就具有不可验证性，如“五帝文化”、“夏文化”、“先商文化”、“中商文化”等。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冈文化等属于“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用上述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可以用整合层面上的概念加以命名的研究取向，其前提是“周甚至周以后的文献”即间接文字材料“是形成关键论点的关键论据”，这正是张光直主张在商文明研究中应加以避免的^[18]。

表三 与商文明有关的都邑遗址的推断意见

朝代与推断都邑		二里头文化	二里冈文化		殷墟文化	
		二里头	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	洹北商城	洹南殷墟
夏	夏都斟寻	√				
	夏桀都	√	√			
商前期	汤都亳	√	√	√		
	伊尹城		√			
	辅（别）都重镇		√			
	太甲桐宫		√			
	太戊新都		√			
	仲丁都囿			√		
商后期	河亶甲都相				√	
	盘庚都殷		√		√	
	武丁—帝辛都殷					√

明确了商前期及更早阶段属于“原史时代”，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把握相关问题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笔者在回顾夏文化探索历程时曾指出，“与夏王朝对应的考古学实体及作为夏王朝主体的族群，由于文献与考古材料的不足，加之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可以认为迄今所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推论的性质。我们认为，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内证性材料（如当时的文字）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解明夏文化的问题的。其实，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和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在对夏文化的探索上，我们只能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最终解决相关问题，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包括商文明前期在内的原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仍是学界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 释

- [1] Glyn Daniel. 1981.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2.
- [2]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3] a.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b. 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
c. 钱耀鹏:《中国原史时代论纲》,《文博》2002年2期;
d. 吴晓筠:《中国的“原史时代”》,《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2》,2002年;《华夏考古》2005年1期。
- [4] 李学勤:《西周文明论集·序》,朝华出版社,2004年。
- [5] 同注[4]。
- [6] 石兴邦:《我很赞成文明探源的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1》,2001年。
- [7] 许宏:《略论二里头时代》,《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20页。
- [9] *Dictionnaire de la Prehistoire*. 1988. 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Andre Leroi-Gourham,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
- [1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4页。
- [11] 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1期。
- [12] 同注[3]d。
- [13]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红旗》1962年17期;又见《考古》1962年9期。
- [14] 陈星灿:《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南方文物》2006年3期。
- [15] 郑光:《试论偃师商城即盘庚之亳殷》,《故宫学术季刊》8卷4期,1991年。
- [16]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页。
- [18] 张光直著,张良仁、岳洪彬、丁晓雷译:《商文明·前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 [19] 同注[7]。

Shang Civiliza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Proto-history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

Xu Ho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stage (pre-history, proto-history, and history) periodization redounds to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grasp of the course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Differing from other opin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arliest history remain

should be Yinxu (the Yin Ruins) in Anyang, the capital of late Shang Dynasty. The times from Longshan period to Erligang period belong to proto-history approximately.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proto-history” and “history” lies in that whether the contemporaneous written records existed and have been found, which can “self-prove” the historical identity of social groups represented by certa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conclusions of research on “proto-history” are not absolute ow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research objects (viz. illegibility and uncertainty). It is a problem on which scholars should keep a watchful eye. To be brief,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of proto-history archaeology, including early Shang Civilization, are still point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further.

河南辉县孟庄遗址夏代墓葬及其相关问题

赵新平¹ 范永禄²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 2. 鹤壁市文物工作队, 鹤壁)

孟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东南麓的辉县市孟庄镇东, 地理坐标东经 113°57', 北纬 35°26'。1992 ~ 1995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四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揭露遗址面积 4600 平方米^[1]。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发现确认了龙山文化、夏代、殷墟三叠城址, 以及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代、商代、两周等时期丰富的遗迹、遗物, 为研究豫北地区先秦诸时期文化遗存及早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孟庄遗址发掘夏代墓葬(发掘报告称其为“二里头文化墓葬”) 23 座, 多有随葬品, 年代上也有早晚之分。本文拟就这批墓葬材料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以就教于方家。

—

这些墓葬当中, X XI T303M1、VIII T89M17 相对孤立, 其他 21 座墓葬集中发现于 VIII、X III 区的一定区域, 但均难以确定为专门的墓地。这些墓葬多成片分布, 排除开口层位不同的因素, 其间排列规律仍不甚明显, 仅少量墓葬可以看出是成排分布的。

VIII 区 15 座墓葬中, M20、M22、M24、M26 均位于 T171 内, 集中分布, 但其开口层位和墓向存在明显差异, 时间上应有早晚之别, 平面布局也不详。M36、M37 位于 T152 内, 均开口于第 2 层下, 墓向 198°, 并排而置。M43、M45、M51 ~ M53、M57 分别位于相邻的 T133、T134、T153、T154、T174 等探方内, 均开口于第 2 层下, 打破第 3 层或 F9, 处于同一层面, 墓向在 185° ~ 205° 之间, 呈南北向大致分布在一条线上, 有的还两两并排而置。M49、M55 位于其东侧, 相距不远, 层位、墓向与前者近同。

X III 区墓葬 6 座, 集中发现于相邻的 T128 和 T149 内。M6、M22^[2] 的层位、分布未见明显规律。M7 ~ M10 均开口于殷代夯土层下, 处于同一层面, 东西向分布成一排。M9 墓主为儿童, 墓向 358°, 余者墓主均成年, 墓向 190°。

23 座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多较狭长, 长度一般在 1 ~ 2.2 米之间、宽度一般在 0.35 ~ 0.8 米之间, 大多很浅。均为单人葬, 除 2 座墓葬葬式不详外, 大多数墓葬为仰身直肢, 仅 VIII T89M17 为俯身直肢^[3]。X XI T303M1 头向东, X III T128M22 头向西, X III T149M9、VIII T171M20 头向北, 余皆头向南或西南, 墓向在 180° ~ 230° 之间, 因此头向西南应为这批墓葬的主流朝向。经性别、年龄鉴定的墓葬 11 座, 其中 5 男 4 女, 2 座墓葬性别不详。从墓主年龄上看 9 个个体为成年或老年, X III T149M9 墓主为 6 岁左右, X III T128M22 墓主为 2 ~ 4 岁, 应未成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X III T149M9 与同排成